

历史学研究

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暨爱民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虽然近年来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果,但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视角切入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的,却不多见。对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结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谱系和类型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既有研究的几个主要关注点作一简要评述,并检讨当前研究中仍存的不足,有利于促进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0)02-003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MZ005)

作者简介:暨爱民(1969-),男,湖南浏阳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博士后,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对中国学界而言,“自由民族主义”是一个从西方社科理论研究领域中移植而来的概念。主要是指充满差异和紧张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实现“一种颇具创意的结合”后建构的理论解释框架。在具体的历史解释中,“自由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西方的理论家如阿克顿勋爵、威尔·金里卡、戴维·米勒、以赛亚·伯林和耶尔·塔米尔等,都主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价值的相容调和,^[1]其中尤以耶尔·塔米尔直接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论述较为系统和全面。她认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已然预设了民族的存在,而民族的价值则必然隐藏在自由的政治纲领之内。虽然自由主义的传统尊重个

体自主性、反思与选择,民族主义则强调归属感、忠诚和团结,但两者实则可以调适在一起。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可以承认归属感、成员身份和文化渊源,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者则可以接受个人自主、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同时也保持对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社会正义和价值承诺。^{[2](P4)}

总观当下中国学界与思想界,虽然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相当进展,^[3]但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视角切入而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的,却不多见。^①就笔者“视界”所及,到目前为止,关于该主题既有的一些相关声音,低沉而微

* 收稿日期:2009-11-18

^① 2006年1月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8月下旬,又在烟台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核心议题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然而令人颇感遗憾,两次会议虽就有关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当中甚至不乏激烈争论,但却未见关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专题讨论。从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没有一篇是真正就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专题展开研究的!这似可说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没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弱,且多起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研究对象亦大多集中在对几个众所周知人物的考察、分析与简评上。^① 本文即拟对既有研究成果做一简单评述,以期推进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研究。

一、近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自由民族主义”?

其实,史华慈和张灏在对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的精辟研究中就已涉及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并未以“自由民族主义”为之标示,但均提示了中国近代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都认为在不同程度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理解、接受来自西方的“自由”,往往并不是因为自由的普适价值,而是因为它能够作为实现民族国家富强的工具。如史华慈说: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严复“所有的信奉必须都放在由国家危机造成的背景中来看”。假如在严复看来,“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与他所关注的事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人们大可怀疑,他对‘自由主义’的信仰是否会如此热诚”。所以,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是自由“能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4](P45)} 张灏则认为,当梁启超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梁氏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落点最终是在民族国家上。^{[5](P135-136)} 张灏还指出,“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念仍有重要影响,在“五四”新知识分子看来,“民主是代表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视民主为一种群策群力、团结爱国的思想”。^{[6](P281-289)}

许纪霖则对近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从思想史领域明确地提出了自由民族主义概念。在其一篇“通论性”的文章中,^②他认为在现代性的开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之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但他又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不仅需要历史的实证,也需要学理上的理据”。因此,他通过从梁启超到张君勱思想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分析,清理出一条关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7]

章清所持与许纪霖大体一致,但分析对象却是

“胡适派学人群”。他认为民族主义构成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并支配了其他的思想倾向。从近代以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养成、自由价值和反思文化传统的立场与用意来看,这些似乎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的政治理念、文化取向,“其实都是在民族主义情感驱使下进行的”。自由主义者“无限忠于其国家,任何时候都没有忘却把民族集体作为社会有机体加以维护和推进当作自己最崇高的基本职责”。在中国,尽管“个人自律与自由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论证的重心要旨,对于如何建立一个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他们也甚为关切”,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更多强调与此相应的一个基本预设:任何国家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对每个个人身体与精神完整的保护与维持”。所以,“从最初的情形看,个人自由所以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主要是看到其作为寻求富强重建民族国家尊严的直接价值,意味着个人价值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解释:一方面要求个人从专制主义的精神羁绊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将个人融化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有机体”。^{[8](P433,440,441)}

对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学界的间接发言相对较多,其中曹跃明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在理论的表面形态上,自由主义者虽然极力鼓吹西方启蒙思想中宣扬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的内容,并没有直接关涉到民族主义的有关

^① 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主要有陈仪深的《自由民族主义之一例——论〈独立评论〉对日关系问题的处理》(刊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年12月第32期);许纪霖的《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刊于《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在现代性于民族性之间:张君勱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刊于《学海》2005年第1期)、《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等。从公开出版的专书来看,正式以近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为题进行讨论的,至今未见,只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有所涉及这一主题。如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② 即许纪霖的《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一文。从文章的标题来看,这是一篇带有通论性质的讨论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论文,但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它只是循梁启超到张君勱的思想史脉络,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因而笔者以为它难以概全近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

题旨,但“如果沿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向内追寻,就会发现他们对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宣传都只有一个目标,即民族的复兴”。对于自由与国家,“自由主义者可以有两种态度:人们爱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一块‘自由的乐土’,这是以自由为最高的目的;或认为自由的价值即在于它可以使国家富强,将自由作为民族国家达到自由与富强的一种手段。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者是属于后一种的”,^[9]所以自由价值的背后,深藏着民族主义的潜流。^[10]

郑永年的论说实际上可看作是对曹跃明等观点的响应。他从介绍与分析西方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关系入手,指出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动呈现出复杂性,“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democracy)变成国家主义(statism)。”所以“一个强有力的国家(state)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利的作用,在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设,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此中国人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主权”,其次才是“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political nation—state)”。^[11](P204—229)

但许纪霖的认识却有些不同。他并没有明确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何者浮现何者潜隐,何者表现强何者表现弱,何者位主何者位次,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了晚清的民族主义建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梁启超将“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放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形成了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7]他认为,从梁启超到张君勱的自由民族主义,“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

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7]

二、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谱系和类型

在这一点上,许纪霖的声音仍然显得有些“孤独”。他指出,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源头的严复和梁启超,开创了晚清的两种世界观。到“五四”时期,这两种世界观“演变为胡适和张君勱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文化路向”,结果造就了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两种思想趋向:其一,“胡适虽然是一个态度上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并非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论述视野中,取消了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这一核心问题。他所理解的共同体只是一个为一元文化进化论所支配的科学/民主共同体,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程序共和国’”;其二,“从晚清的梁启超发端,为‘五四’后的张君勱所继承的自由民族主义传统,试图以一种心/物、道德/政治二元论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精神心灵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试图将具有中国独特精神价值的民族共同体与普世化的民主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既符合全球化普世目标、又具有中国特殊文化精神的民族国家共同体”。^[7]

其实,许纪霖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地做类型学分析和区隔,亦未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脉络进行全面地梳理。他只是重点分析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勱这一脉络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演变:“晚清的梁启超所致力建构的是以国民自主为核心的‘公民共和国’,“张君勱所理解的则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共和国’”。但张君勱与梁启超一样,“把国家与个人放在一个积极互动的有机关系里面加以阐释”,而这样的互动关系,“又是以心物二元论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7]

如果模糊一点看,张连国“理性民族主义”也可视为对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种提法。他通过对《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的分析,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两难的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服从于个人主义的做

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可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类型”。“所谓价值理性,指其‘理性’是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关怀,民族主义是形式,个人主义是实质。所谓工具理性,其‘理性’是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的考虑,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被搁置或放弃,民族主义已名副其实”,“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蒋廷黻为代表”。^[12]

三、既有研究的几个主题

(一)关于胡适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罗志田认为,胡适的世界主义思想中有着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胡适“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并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但他“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以为中国不亡的远因”,“而最终是要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所以贯彻胡适思想里面的是他对祖国“深挚的爱”。罗志田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13]美国学者格里德认为,胡适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接受这样一种信念:“解救中国是他们特殊的权利和义务”。^[14](P285-286) 胡适从未忘记过,“他是一个中国人”,“他也从未放弃过这样一种信念,他那些别的‘外国理论’对他的人民将会是有益的”,他与那些“最热烈的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一样,对中国疾病进行诊断,并积极为这个“病人”的“康复”寻求“救治良方”。格里德提醒说:“使胡适与民族主义的保守派的实践者和激进派的实践者区别开来的”,并非胡适对中国命运的“漠不关心”,而是在“怎样最好地保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种文化生存下去的问题上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观念分歧”。因为在胡适看来,他断言的“‘现代’政治理论与个人尊严和思想独立的价值准则一致性”两方面,是民族与文化“复兴”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4](P272-273) 以上研究都肯定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之中的民族主义。

(二)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许纪霖认为,梁启超的个案,很可以回答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梁启超并不曾以自由民族主义自我命名,但从晚清开始,他就致力于融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既肯定个人的自由意义,又寻找民族的集体认同,在这一点上,与“伯林等人有着共同的

价值取向”。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以《新民说》为轴心,大约分为前《新民说》时期、《新民说》时期、后《新民说》时期和民国时期四个阶段。其中“在思想史上发生最大影响,最能体现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精华的,乃是《新民说》中所代表的国民共同体论述”,“在《新民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与现代自由民主理念不仅不相冲突,而且因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他的民族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是共和主义的,强调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通过契约形成公意;更是康德主义的,将现代国民视作对传统奴隶的否定,强调其个人道德和意志上的自主性”。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到“五四”时期,梁氏民族主义的认同重心“从国民共同体和国家主义共同体,转移到了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从而使“梁启超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从他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和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15]

(三)关于张君勱的民族主义思想。

许纪霖认为,张君勱接续了梁启超有着“深刻的儒家特征”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趋向:“个人只有在集体的民族性中才能获得个性,个人自由只有在民族自由中才能养成,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相互冲突,而是内在和谐的”,但“民族政治只能保障消极自由和提供平等的、公道的自由条件,而个人自主性,只有在一个有机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传统中才能实现”,“张君勱将个人自由放在民族文化的有机传统中加以理解,力图创造一个以个人自由精神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这正是它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16]

(四)关于《独立评论》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

除了上述张连国之“理性民族主义”的指称外,还有张太原的考察与分析。后者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之对外“反抗”一面来考察《独立评论》同仁在面临急迫民族危机时的对日态度。张太原认为《独立评论》是因应日本侵略的产物,因缘中华民族危机,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相冲突,两者反成“双生兄弟”,“民族主义是实现自由主义的条件”。自由主义者根据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而确定其对日态度,“在‘最少损失’的前提下‘能和则和’”,但无论“主战”

还是“主和”，都是这些自由主义者“试图使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特色”，且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党派背景，没有现实的切身政治利害”，因而在对日态度上往往“更为洒脱，更无顾忌，特别是相对于国民党属下的各派政治力量，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似乎更富有独立性”。^[17]

台湾学者陈仪深同样从“《独立评论》对日关系问题的处理”切入来分析围绕《独立评论》之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陈仪深的理论依据是以色列学者塔尔·耶米尔的“自由民族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的传统价值与民族主义的传统价值实有相涵容的空间”。据此他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同仁，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表现出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特色，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伪满成立以迄七七事变全面战争爆发之间，曾屡次呼吁国际联盟介入调停以便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反对以榨钱、拉夫的野蛮手段驱使同胞对日作战，主张在未失的疆土上面努力‘抵抗’——以阻止日本在伪满意外的中国领土上得寸进尺”。陈仪深说：“就像 Yael Tamir 所描述的自由民族主义特点，《独立评论》的同仁似已尽量‘把国族思考放在自由主义的界限内，而不偏废其一端’，‘不牺牲别的价值来终极地追求另一套价值’，‘个人的反省、选择，与国家的历史、命运同样重要’”。陈氏指出《独立评论》同仁因“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受到自由主义的范限”，而与“徐炳昶、董时进的暴虎冯河”以及“发起学生运动而策动罢课”的许多激进分子不同，与“动辄把‘抗日’、‘反蒋’绑在一起的地方势力”不同，与“迟不开放宪政而且向往法西斯的政府中人”不同，体现出“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日国力悬殊，应寻求国际调停，不放弃和平解决希望；勿奢言收复东北，亦勿轻言开战，但须即作有计划的准备，在未失的疆土上力求抵抗”。所以考察《独立评论》对中日关系问题的处理，“可以进一步肯定其民族主义立场，是热情中带着理性、坚持中包含妥协”，应该可以直接称之为“自由民族主义”的表现。^[18]

四、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通过上述学术史的检讨，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当前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及其递演的系统全面的学术关怀，与关于近代中国之自由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研究的热烈景象相较，显得

冷清了许多。尤关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谱系、理论与实践形态、内在逻辑、政治诉求和文化态度等等方面，都缺乏一个整全性关照。就个人所见，即使既有的专题研究亦只是为该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刚刚开了个头，而且尚存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或不足。

第一，缺乏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构成内容、表现形态、内在特征、运作机制及其演化进程的清理和研究。关于这一点，许纪霖仅根据从梁启超到张君勱的理路，指称他们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儒家深刻的特征”，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7]依笔者浅见，许纪霖在这里所揭示的只是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一个个案特征。因为他仅限于从梁启超到张君勱的脉络梳理，并非对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整体性考察。因此，并不能视如其文题所昭示，很难说是对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的总体清理和抽象。

第二，对“民族主义”概念和内涵的狭隘理解，导致整体研究视野受到局囿，从而使研究对象仅限于几个人物的思想分析上，大大缩小了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所本该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还是就许纪霖的专题研究而言，仅集中在梁启超和张君勱的思想论析上。可想而知，沿这条思想脉络的演进路径，其“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研究走向了所谓“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结论，是其理论与研究逻辑的合理结果。而作为比较对象的胡适，许纪霖教授的看法是：“虽然是一个态度上的爱国主义者，但它并非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论述视野中，取消了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这一核心问题”。^[7]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面相和具体的内涵。它建立在中国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在对内与对外的两个面向上有着具体的诉求，既可是建构性的观念（意识）形态，又可为社会政治中的实践运作，常表现为一种对独立自主、统一强盛的民族政治共同体的追求和理想，或为谋求民族利益和现代价值实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或崇尚本民族特征和文化；或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建立统一市场，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和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以此观照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言与行，笔者难以认同将他排出民族主义之列的结论。关于胡适一生的思想与志业，笔者这里很是同意罗志田先生的判定，“要为中国再造文明，

以为中国不亡的远因,而最终是要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尽管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并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但“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13]

对造成这一关于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问题研究拘囿的主因,笔者以为是出于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缺乏一个广阔的理论视野。实际上,如上所述,在时间的序轴上,自晚清严复、梁启超以来,经过“五四”、后“五四”时期,抗战爆发前期、抗战时期乃至抗战结束后,不同的历史阶段,自由民族主义思想都有不同呈现,形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演进脉络。这就要求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作客观具体的分析厘定、判断与评价,而且更要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并能抱持历史主义态度,真正在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语境中解读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而使该研究成为很有必要同时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一项工作。

参考文献:

- [1] 阿克顿. 论民族主义·自由与权利[M]. 侯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5-134.
- [2] 耶尔·塔米尔.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 陶东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3] 暨爱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J]. 教学与研究,2006(1).
- [4] 史华慈著,叶凤美译.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5]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6] 张灏. 张灏自选集[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7] 许纪霖.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J]. 社会科学,2005(1).
- [8] 章清. “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9] 曹跃明. 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思潮与民族主义运动[J]. 天津社会科学,1993(1).
- [10] 曹跃明,徐锦中.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路[J]. 天津社会科学,1996(5).
- [11] 郑永年. 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提纲)[C].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0.
- [12] 张连国.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J]. 江苏社会科学,1999(1).
- [13] 罗志田. 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J]. 近代史研究,1996(1).
- [14] 格里德著,鲁奇译.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15] 许纪霖. 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2005(1).
- [16] 许纪霖. 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张君勱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J]. 学海,2005(1).
- [17] 张太原. 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C],郑大华等.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8] 陈仪深. 自由民族主义之一例——论《独立评论》对日关系问题的处理[J].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12(32).

(责任编辑:陈伟)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beral Nationalism

Ji Ai-m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field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accomplishments o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practice through the angle of liberal nationalism has been scarcely approached.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simple summary and comment on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beral nation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and the ideology genealogy and type of liberal nationalism as well as the main focus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In this wa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deficiencies in recent stud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issu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liberal nationalism